

中国哲学史纲

郝逸今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哲学史纲

郝逸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纲/郝逸今著.一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3

ISBN 978 - 7 - 81115 - 600 - 3

I. 中… II. 郝… III. 哲学史 - 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709 号

书名	中国哲学史纲
著者	郝逸今
责任编辑	浩斯巴雅尔
封面设计	张燕红
出版发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010010)
销售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刷	内蒙古政府机关印刷厂
开本	787 × 960 / 16
印张	49.75
字数	770 千
版期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1115 - 600 - 3
定价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中国哲学史纲》序

1952年，国家教育部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嗣后北大哲学系成立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经过两年的准备，于1954—55年度开始讲授新观念的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冯友兰先生讲先秦至汉初的哲学，由我讲汉魏至明清的哲学。当时听课的很多，有些同学对于中国哲学史很感兴趣，其中郝逸与同志对中国哲学史的兴趣最为浓厚，经常在课外提出一些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问题^{进行讨论}。后来郝逸与同志到内蒙古工作，于1978年到内蒙古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撰写了《中国哲学史纲》专著。1995年突然逸与同志不幸因病逝世，突出意外。近接逸与夫人张万生同志来信说，内蒙古大学决定出版逸与遗著“中国哲学史纲”。^{去年}我听到

逸今同志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今回他们的遗著即将出版，又感欣慰。此书是逸今同志精心撰写的，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述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并把哲学史研究与宗教、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最显著的特点是增加了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对于有蒙古族英雄史诗之称的《蒙古秘史》的蕴含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探索。这是值得称赞的。

张万生同志以逸今遗著的内容见示，邀我写一篇序文，于是略述我和逸今同志的友谊及《中国哲学史纲》的特色，作为序言。

一九九六年十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时年八十九岁。

序

1952年，国家教育部进行高等教育院校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嗣后北大哲学系成立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经过两年的准备，于1954—1955年度开始讲授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冯友兰先生讲先秦至汉初的哲学，由我讲汉魏至明清的哲学。当时听课的很多，有些同学对于中国哲学史很感兴趣，其中郝逸今同志对中国哲学史的兴趣最为深厚，经常在课外提出一些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问题进行讨论。后来郝逸今同志到内蒙工作，于1978年到内蒙古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撰写了《中国哲学史纲》专著。1995年突闻逸今同志不幸因病逝世，实出意外。近接逸今夫人张万生同志来信说，内蒙古大学决定出版逸今遗著《中国哲学史纲》。去年我听到逸今同志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今闻他的遗著即将出版，又感欣慰。此书是逸今同志精心撰写的，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述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并把哲学史研究与宗教、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最显著的特点是增写了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对于有蒙古族英雄史诗之称的《蒙古秘史》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探索。这是值得称赞的。

张万生同志以逸今遗著的内容见示，邀我写一篇序文，于是略述我和逸今同志的友谊及《中国哲学史纲》的特点，作为序言。

一九九六年十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时年八十有七。

绪 论

文明而古老的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四千多年前,光辉璀璨的中国古代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支光芒四射、绚丽多彩的人类智慧的奇葩。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中国哲学是民族文化之精华,是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据可考的文字资料,中国哲学思想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哲学逐渐形成。当时的诸子百家之说,促进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繁盛。在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哲学思潮互相对立,互相斗争,彼此吸收,张弛起伏,形成了一条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总结中国哲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对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意为智慧之学,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古代称这门学问为“道”、“道术”、“玄学”、“道学”、“理学”。哲学思维是一种理论思维,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一个民族的哲学代表了这个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

哲学始终与人们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它是将人们的世界观用理论的形式加以高度的抽象概括,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逻辑推理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所以,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一般地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一致的。所谓方法论,是人们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系统理论。哲学是世界

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哲学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的特点。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哲学都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要受所处时代的制约。一种哲学的产生要赖于时代所提供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条件。哲学以它特有的方式反映时代,概括和表现时代精神,因而,其内容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

哲学的民族性体现在: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载体是不同的,如语言不同,范畴体系不同,思维形式不同,所特别关注的问题也不同。每一种哲学都立足于本民族的经济文化条件和人文背景中来体现本民族的精神面貌、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因此,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就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欧洲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区别。

哲学还有阶级性的特点: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总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观察和认识世界,阶级不同,对世界上各种问题的看法也不同。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是属于一定阶级的观念体系。所以,哲学具有不同的阶级倾向和阶级属性。哲学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植根于经济基础,并为它服务。因此,哲学体现着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集团的愿望、意志和要求。但哲学并不是直接反映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是通过向人们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式,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总体和概括,涉及众多领域,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归根结底哲学是要探明世界的本原,探求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因而,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思维是指人的观念、意识和精神;存在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二者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谁是根源,谁是派生物,谁决定谁的问题,这在哲学史上属于本体论。所谓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原或本质的理论。另一方面,是人的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客观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这在哲学史上属于认识论。所谓认识论,是研究思维能否认识存在以及如何认识存在的理论。

如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它规定着哲学的基本路线、哲学家们的立场和解决其他哲学问

题的根本方向。因此,是任何哲学派别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哲学史上各派哲学斗争的焦点。

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探讨的主要问题也蕴含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如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天人之辩、形神之辩、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理气之辩、心物之辩以及道器关系、知行关系等,都蕴含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辩,并逐步趋向深入和明晰。

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科学标准,使我们能够科学地把握各哲学派别的本质。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区别哲学基本派别的唯一科学的标准。依据这一标准,哲学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派生物;唯心主义认为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物质是意识的派生物。总的来说,一切哲学归根到底不是属于唯物主义,就是属于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及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唯物主义经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基本发展阶段,即三种基本历史形态。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初形态。其基本特征是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否定了由“神”创造历史的观点,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原初物质。如我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生成万物的基本物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坚持了世界物质性的正确观点,但缺乏科学论证,具有直观性、朴素性和猜测性。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特征是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因此,它具有机械性(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形而上学性(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和不彻底性。其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是唯物主义的,而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却是唯心主义的。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但它继承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高举无神论的旗帜,在反对封建主义、经院哲学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

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总结了无产阶级的斗争

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构成的完整的、严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是最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哲学形态。

哲学的另一基本派别是唯心主义,它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形态: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在万事万物之前,先有一种神秘的“客观精神”,它是万事万物的本原,物质世界只不过是这种客观精神的产物和表现。中国哲学史上宋代程朱学派的“理”,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德国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是这种作为世界本原的客观精神。

主观唯心主义是把人的主观精神如感觉、观念、心灵、意识、意志等,当做世界的本原,是世界上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和基础,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精神派生出来的。我国宋明时期陆王学派的“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吾心即是宇宙”等,就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基本派别的产生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在阶级社会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是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分不开的。一般地说,社会上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为了变革现实,发展生产,促进社会进步,常常以唯物主义观点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本质规律,因而成为唯物主义哲学的社会基础;反之,社会上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维护自己即将失去的统治和利益,常常掩盖事实真相,与唯心主义哲学相联系,成为唯心主义的社会基础。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基本派别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相互对立、相互斗争,贯穿于哲学思想发展的始终。

哲学不仅要回答世界本原的问题,还要回答世界的状态是怎样的问题,即世界是否运动的问题。对此问题不同的回答,形成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没有绝对静止和永恒不变的东西;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不只是量的变化,而且有质变和飞跃;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主要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在于事物自身所包含的矛盾性。辩证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形态:即古代朴素

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与辩证法相反,形而上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和固定不变的;否认事物的根本质变和飞跃,只承认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外力的作用,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自身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学说,它不构成哲学的基本派别,而是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既可以与唯物主义相结合,也可以与唯心主义相结合,也就是说,辩证法既存在于唯物主义体系,也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形而上学也是如此。在同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有时既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对矛盾形成了交错复杂的情形。它们互相对立,互相斗争,在斗争中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情况。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这种相互斗争,相互否定,彼此影响和相互渗透,以至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历史就是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哲学史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反映各个阶级利益的,以逻辑思维形式(注意不是形象思维)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哲学史就是这种思想产生、发展及其不同观点相互斗争、影响、转化、替代的历史。

研究哲学史需要具体考察哲学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如何解释或说明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社会生活和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史上不同哲学思想家的理论和观点并不是彼此没有联系的、孤立的,各自的哲学体系中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某一哲学思想家的理论体系中有时可能有不同观点同时并存,交互纷呈。哲学史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思维等认识的前进、上升、深化的发展历史。不过这一认识过程并非是直线上升或前进的,而是波浪式和螺旋式地曲折前进的。这一波浪和螺旋的主轴线便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

中国历史是漫长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是色彩缤纷、绚丽多姿的。它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

学、宋明理学诸阶段。

中国哲学最初所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在与奴隶主宣扬的上帝创世说的唯心主义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朴素唯物主义者从自然物质本身去探求万物的根源，从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质中选取出一种、两种或多种物质，用以解释和说明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基础。中国古代的“阴阳”说、“五行”说、“水为万物之源”说就是这种理论思想的代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天启”说、“创世”说的否定，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形态和抽象思维的模式。

春秋与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哲学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观。诸子之学，百花竞开，争奇斗妍，故称这一时期为诸子百家时期。当时“《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学之传。”（《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子百家”是指：“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阴阳二十一家”、“法十家”、“名七家”、“墨六家”、“从横十二家”、“杂二十家”、“农九家”、“小说十五家”，“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汉书·艺文志》）诚可谓思想活跃，学术繁荣。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在发生变革，奴隶制的瓦解与封建制的形成已成为历史的发展趋势。奴隶主贵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奔走呼叫，新兴地主阶级为自己主宰社会历史而制造声势和舆论。在这种风云变幻之际，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学派在理论上各自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和社会伦理原则。在诸派中其可观者便是所谓的“九流十家”。而在十家之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荀韩为代表的法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等。各个学派“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互相攻讦。

儒家主张“法先王”，推行仁政和礼治，宣扬先验论和命定论。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宣扬返璞归真。法家主张“法后王”，推行法治，宣扬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名家则提出“合同异”、“离坚白”的理论。墨家从小生产阶层利益出发而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道德原则。从哲学理论上讲，有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与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之争，也有以精神为世界本体与以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为宇宙本原的论争。还有以一种特殊或

更概括而又极细微的物质“气”作为万物的基础。这说明古代人对宇宙、自然、万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阶级斗争推动阶级社会的发展。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代之而起的是刘汉王朝。刘汉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结束了。董仲舒把神学与哲学合二为一，建立起神学目的论和奉天法古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以新的更加隐蔽的手法宣扬宗教唯心主义，要人们通过一些自然现象去体认和省察上帝的意志。这种神学目的论比宗教赤裸裸地宣扬上帝的存在显得更加精微和巧妙。

东汉门阀士族的形成，为宗教唯心主义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当时神学目的论与谶纬迷信结合起来，成为东汉时受官方支持的哲学。“绿林”、“铜马”、“赤眉”的农民起义冲击着东汉地主阶级的统治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代表“细族孤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王充的思想是在与董仲舒神学目的论、奉天法古唯心主义的论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王充提出“元气”自然论与董仲舒的“天志”、“天意”、两汉时期的谶纬经学展开了论争，把先秦时期的朴素唯物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时门阀士族为了维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地主阶级的统治，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王弼等人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代替了神学目的论。以玄学的体系和命题，以抽象的本体“无”代替了宗教神学的“上帝”。实际上玄学与宗教神学是一脉相承的。魏晋玄学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是两汉之际黄老之学的演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民族特色、新颖而不晦涩的一章。其理论的思辨性启人深思，其思想的意蕴耐人寻味。

魏晋玄学的特点是从以儒家思想为主转向以道家为主，把《易经》老子化，把《老子》庄子化，以老庄的思想观点解释《易经》。儒家思想的地位在下降，道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在提高，把儒家思想融于玄学之中。魏晋时期的哲学理论从侧重探讨宇宙生成论转向阐述玄学的宇宙本体论。其论证手法具有更加浓厚的思辨性和逻辑性。这一时期的哲学形式从神秘化到理性化，神学色彩减弱。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虽然仍有“上帝”的阴影，但已不是赤裸裸地宣扬“上帝”是造物主、“上帝”主宰人类社会，也就是说玄学否定了天的目的性，肯定了天的自然性，降低人们对天的依附性，相对地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比较强

调人的主观自觉性和能动性。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思想上的一次解放。

魏晋时期的哲学家,从恪守名教而发展为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观物取象而发展为“得意忘象”。玄学家追求个人的人格完美。主张以意抒情,观察宇宙、探索人生多以艺术的视野与艺术的手法。“山欲主,尽出之则不高,烟锁其腰则高矣。”这就是以艺术的视角对美的意境的追求。玄学家要言不烦,主张“言不尽意”,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另辟蹊径,独抒己见。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既是哲人又是文学家,哲学与文学密切结合,哲学思想与文艺理论声息相通。

魏晋时期的哲学命题由复杂到简约,由具体到抽象。玄学家欲寻觅更高的哲学范畴,如用本末、有无、动静等以统摄和诠释宇宙万有。对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运动的属性等都有所论述。诸如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物质运动在时间上的顺序性与连续性,在空间上的广延性与形态方位等。玄学家认为一切具体事物都不过是抽象原则的例证。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抽象思维水平提高了,我国古代哲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这一时期的理论思维却减少了与自然科学的联系。这一思想体系和特征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

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传入我国以后,至李唐王朝时得以迅速发展。佛教内部的许多流派演化为众多的宗派。东晋时由于对道安、慧远宣扬的“般若经”的理解的分歧而形成的不同流派有:本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从本无宗又分化出本无异宗,这就是所谓的“六家七宗”。至唐时又发展为:三论宗、律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密宗、禅宗等宗派。流派不同于宗派,前者系由对佛教经典理解的分歧而形成的学派;后者则具有政治倾向性,每一宗派均依附于一个贵族势力集团。各宗派均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宗教制度、独立的寺院经济以及自己宗派的理论体系和法规,各宗派均有自己的继承人与寺庙财产等。各宗派之间互相评论称之为“判教”。佛教各宗派的形成,标志着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深入、发展、兴盛。

唐时的黄巢起义,沉重打击了门阀地主阶级,也冲击了盛极一时的佛教唯心主义。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果实,一次又一次地被地主阶级所夺取。宋以后的封建政权仍为官僚地主所把持。新的官僚地主阶级代替了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后,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强化了维持封建政权的军队、法庭、刑狱等国家机器。封建统治进一步加强,封建伦理

秩序进一步巩固。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兴起了宋明理学。

宋、元、明、清时期兴起的理学思潮,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的孔孟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吸收并改造了南北朝以来盛行起来的佛学。提出了“理”、“太极”等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并与封建伦理道德相联系,囊括了自然、社会,包罗了封建的礼法和礼教,为封建的等级秩序、伦理道德、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较之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有着更为现实的世俗特征,把唯心主义本体论推向新的高峰,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完备、系统、庞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宋、元、明、清中国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之际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繁荣时期。宋至明这一历史时期,学术文化出现了许多思想流派。著名的有周敦颐和邵雍的“象数之学”、程颢和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此外,还有王安石的“新学”、陆九渊的“象山学派”、王守仁的“姚江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以及活跃于河北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等。这些学派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推向了巅峰。

两宋时期文化的复兴,是先秦诸子之学的一大觉醒,明清之际的学派林立,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大解放。医不必出自扁鹊,书也非仲尼一家,那种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历史格局已被冲破。封建文化得以长足地发展。宋至明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战线在理学内部先后形成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与陆王主观唯心主义两大流派,即“理学”与“心学”的对立。理学的中心命题是“性即理”,心学的中心命题是“心即理”;理学认为“理”是第一性的,心学断言“心”是第一位的;理学坚持“理”是客观事物的依据,心学强调客观事物是以主观“心”为基础。理学家朱熹、心学大师王阳明集历史上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之大成。宋明理学在历史上产生过“礼教食人”的社会影响。其思想渗透到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在长达八九百年的时期里,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尊为官方哲学。清康熙玄烨就曾推崇理学是“裨益政治”的“内圣外王”之学。

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潮,冲击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促成了历史上一代思想家张

载、王夫之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成长。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者在理论上迎接了唯心主义者的挑战，强调以物质的“气”与“器”为本，以唯物主义的本体论驳斥了以“道”与“理”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宋明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建立了系统的哲学思想理论，把中国历史上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推向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斗争无论在广度、深度和尖锐程度上都是历史空前的。因而民主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个变革封建体制的社会思潮冲击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封建顽固派恪守“祖宗之法不能变”；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主义者只讲改良，不言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则主张推翻封建专制政体，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造舆论。脱胎于封建社会又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洗礼的严复、章炳麟等思想家这一时期介绍了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欧洲资本主义初期所形成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古老的中国广泛传播资本主义近代的科学思想。严复的“自由论”、谭嗣同的“以太说”、孙中山的“生元说”，在当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政治上的软弱无力，理论上的妥协性，因此匆匆上阵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打了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

辩证法思想与唯物主义思想一样，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悠久的历史。从发展上看，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一步一步地由低到高、由粗入精、由片面到更多的层面发展着。辩证法是一种宇宙观，辩证又是一种方法论，中国哲学史上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也存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

我国古代辩证法绚丽多姿，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一样均具有朴素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又缺少科学的基础，因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常常与唯心主义观点相结合，而且其内容也较为笼统和抽象。如《易经》中的“阴阳”思想虽揭示了自然界和社会两种普遍对立事物的相互作用，用以解释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但却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再如《书经·洪范·九畴》的“五行”说，解释了宇宙的成因，并以五种物质相生相克说明万物变化的永恒性。“五行”说虽具有鲜明的辩证法特征，但也有着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

伴随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一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和提高。《孙子兵法》和《黄帝内经》拓宽了辩证法思想领域，用辩证法思想指导军事实践和治疗疾病、辩证施治。

可惜的是它只触及到个别具体学科领域的知识,也就是说是对具体事物的总结和概括,还不具有普遍规律和方法论意义,也即是说尚未提到对客观物质世界总体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高度。

中国历史上汉代的王充、南北朝的范缜其哲学思想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宋代张载、明代王夫之、明清之际的戴震,他们的辩证法思想更加多姿多彩,其所达到的高度是两汉、魏晋、隋唐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宋明之际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如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里辩证法思想也在熠熠生辉。他们是一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者。

中国近代,由于大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分工和科学的分类以及独立的科学实验与静止的观察,又使得机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处于纠葛状态,使古代辩证法获得新的发展。

总之,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标明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所走过的历程。标志着不同时代哲学思想家和不同学术流派在人类认识的历史长廊上所画出的大大小小的“圆圈”。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其理论思想的升华也是螺旋式地上升。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家既给我们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给后人一些可贵的经验教训,它将永远启迪、垂训后世。